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李治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 录



第一章	嗣位之争	(1)
第二章	永徽之治	(32)
第三章	边疆战争	(98)



第一章 嗣位之争

一、天性荏弱

唐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十五日,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降生于东宫的丽正殿,取名治,字为善,小字雉奴。至于李治为什么会生于东宫,则是因为李渊退位以后,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才迁出紫极大内。这期间,李世民仍居东宫听政。

李治少年时期的经历,史籍记载极少。寥寥数语之间,我们仅知道他在四岁的时候,受封为晋王,后来遥领并州都督,又加拜右武侯大将军而已。当时,人们很少谈到李治,似乎忘记了这位九皇子的存在。其中的原因,除了帝王子孙封王拜将事属平常,并无什么实际政绩可言以外,一是李治生性柔弱,喜欢安静,不是那种锋芒毕露、引人注目的角色;二是魏王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储君之位,勾心斗角,风波频起,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李治的这两位胞兄身上。不过,后来时势的变化证明,这种冷落对李治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李治降生之日,为了表示庆贺,李世民宴请了五品以上的官员,并下诏赏赐这一天生子的臣民粟米。但是,忙于军国大政的李世民并没有对李治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尽管帝王得子是一件喜事,而李治的生母又是长孙皇后,属嫡子之列,特别是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绝非寻常可比。后来,李治稍长,开始向著作郎萧德言学读《孝经》,李世民问李治:“此书中何言为要?”李治回答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李世民闻言大悦,方才对李治另眼相看。不过,李世民对李治的赞赏,更多的

李

治



是基于一种宽慰,认为李治如果恪守《孝经》宗旨,身体力行,则“足以事父兄、为臣子”而已,并没有抱什么过多的期望。因为李世民那时还认为,李治过于柔弱,既少才华,又乏胆略,与自己相比,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根本不可能继承大统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这一时期中的李治,如果说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什么印象的话,那就是“宽仁孝友”。其实,这四个字也可以用来概括李治一生中为人处世的基本特点。但是,追寻这种性格形成的根源,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仅缺乏有关这一问题的直接资料,甚至从李治周围的人身上,也很难找到间接影响李治性格的大量因素。

李世民刚毅多谋,胆识俱佳,而且雄心勃勃,不甘屈于人下。自李渊起兵太原,李世民参与谋议,联络豪杰,统军出征,剿灭群雄,冲锋陷阵,指挥若定,为大唐王朝的建立与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充分显示了他的出众才华。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前后,李世民谋夺储君之位,同室操戈,弑兄杀弟,迫父让位,策划周密,毫不手软。尽管旧史竭力隐讳此中真情,极尽涂抹粉饰之能事,却无论如何不敢用“宽仁孝友”之类的词句来形容这位圣主明君。而李世民认为李治“仁懦”、“柔弱”,与自己不甚“相类”,事实上也承认了自己对李治性格的形成并无太大的影响。

长孙皇后为人宽厚,似乎与李治的性格有某种传承关系。长孙氏曾被异母兄逐出家门,及立为皇后,不记前嫌,多次请求李世民对这位异母兄加以厚待,使其位至监门将军。后来,这位异母兄牵连谋反大案,李世民欲加诛杀,又是长孙氏为之求情,得以免死。后宫之内,嫔妃有获罪者,长孙氏每每为之开脱,不使蒙冤。豫章公主生而母亡,长孙氏亲自抚养,视如己生。侍婢染疾,长孙氏尤加关照,用自己所服的药物为其治疗,故上下感戴,服膺其德。李治的性格受其生母影响,看来没有什么疑问。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宽厚只是长孙氏性格的一个侧面。其实,人们从她的言行中感受最深的是她的聪慧与明智,而李治对这



一点却继承得很少。

长孙氏少好读书，尤识大体。自从十三岁时与李世民成婚以来，不仅克尽妇道，而且颇有内助之功，尤其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明争暗斗，冲突频起之际，长孙氏上奉李渊，下事后宫，为李世民周旋弥缝、消嫌释猜，费尽心机。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将率将士入宫，长孙氏亲加慰勉，众人感奋，对政变的成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是，李世民登基以后，长孙氏立为皇后，虽贵宠无比，却坚决不肯干预朝政。李世民多次试图与她谈论军国大事，长孙氏都加以推辞，认为：“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豫闻政事。”李世民询问再三，长孙氏始终不答。李世民无奈，只得作罢。长孙氏最明智的举动，莫过于抑制亲族，不许他们居高位、掌大政。李世民曾打算任命她的胞兄长孙无忌为相，长孙氏竭力劝阻。她对李世民说：“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戒，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李世民不从其请，长孙氏又暗中命长孙无忌坚辞不受，结果李世民只好让步。及长孙氏病危，太子李承乾请求宣布大赦，广度僧道以袪灾，长孙氏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示存异方之教耳，非惟政体靡弊，又是上所不为。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当时，李世民与朝臣也曾议论实行大赦，但长孙氏执意不从，事遂不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长孙氏的宽厚也是以一种通达机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贞观六年（632年），长孙氏之女长乐公主下嫁，李世民命有司厚加资送，规格超过永嘉长公主。魏征力谏，李世民将此事告诉了长孙氏。长孙氏说：“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承恩礼，每言必先候颜色，不敢轻犯威严；况以人臣之疏远，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从。”一次，李世民罢朝，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氏问明原委，换上朝服向李世民道喜。李世民不解其意，长孙氏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



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一席话说得李世民怒气全消，心中大悦。

长孙氏不仅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子女，而且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太子李承乾的乳母曾对长孙氏说：“东宫器用阙少，欲有奏请”长孙氏回答道：“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立德扬名，这是长孙氏对太子李承乾的期望，同时也是她对自己所有子女的期望。令人遗憾的是，李承乾并没有认真听取她的训诲。至于李治，情况似乎更糟。李治继承了她的宽厚，却没有继承她的明智。尤其是她政治嗅觉的敏锐与为人处世的练达在李治身上几乎毫无反映，而这此品质往往是一个成功的君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在激烈的权力冲突中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天性中的良善使自己免遭不测。李承乾辜负了长孙氏的期望，失去的只是太子之位；而李治缺乏应该具备的品质，失去的却是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

李治九岁的时候，长孙氏与世长辞，年仅三十六岁。长孙氏临终，嘱咐李世民说：“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槨，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这位皇后的早逝，使李世民悲痛万分。长孙氏生前曾经把古代妇女的美德与善行搜集起来，编成《女则》十卷，并亲自作序。长孙氏死后，宫司将《女则》呈上，李世民睹物思人，更增悲痛。他把《女则》展示给近臣，对他们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对李世民来说，长孙氏既是爱妻，又是良佐，自然难以忘怀。事实上，长孙氏之死的确对李世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少使



他在一段时间里感到寂寞。不过,帝王毕竟是帝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往往只是暂时现象。不久以后,李世民便开始打算另立一位皇后。而对长孙氏的子女来说,他们失去的却是母亲。尤其对九岁的李治来说,这一损失是巨大而永远无法弥补的。从现存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直接记载来说明长孙氏对李治如何疼爱,但是,从长孙氏的为人以及长孙氏死后,李治哀泣不已,左右皆为之感动的情况来看,母子之间的感情相当真挚深切,并没有虚伪矫饰的痕迹。而李治也的确不是一个善于弄虚作假的人。后来,李治在谈到长孙氏时曾说:

“寡人不造,咎谴所钟。年在未识,慈颜弃背。终身之忧,贯心滋甚。风树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龙忌之辰,岁时兴感。空怀陟岵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远,瞻奉无逮。徒思昊天之恩,罔寄乌鸟之情。”

从中可以看出,李治对亡母的思念深沉而持久,影响不可低估。

李治的哀泣不止使李世民又添几分悲痛,同时也使他对这个幼弱的儿子增加了几分怜惜。他尽力而为,安慰李治。为了表示对李治的优宠,加拜他为右武侯大将军。但是,这时的李治对政治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因此,加官进爵能否真正使李治丧失母爱的悲伤得以缓解;事实上很难说得清楚。而我们却有理由认为,长孙氏的早逝使天性柔弱的李治在成长过程中遇到了某种障碍,使他的性格中更加缺少自信与决断的因素。

二、承乾、李泰鹬蚌相争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二十六日,五十三岁的唐太宗李世民,因服食天竺方士的丹药中毒驾崩。

孱弱的李治成为继承王位的最佳候选人,这是命运与英姿天纵李世民开的一个玩笑。

唐太宗李世民共有十四个儿子,他们是:



长子	恒山王承乾	生母长孙皇后
次子	楚王宽(夭折)	生母不详
三子	吴王恪	生母炀帝女杨氏
四子	魏王泰	生母长孙皇后
五子	齐王祐	生母阴妃
六子	蜀王愔	生母炀帝女杨氏
七子	蒋王恽	生母王氏
八子	越王贞	生母燕妃
九子	晋王治	生母长孙皇后
十子	纪王慎	生母韦妃
十一子	江王嚣	生母燕妃
十二子	代王简	生母不详
十三子	赵王福	生母杨妃
十四子	曹王明	生母元吉妃杨氏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长子承乾出生的时候,李世民还是秦王,承乾生于承乾殿,所以以殿名为名。第二年,一岁的承乾就被封为恒山王。太宗即位时,承乾八岁,按照立嫡以长的原则,他顺理成章地被立为皇太子。

承乾自幼天资聪慧,颇受太宗喜爱。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太上皇李渊驾崩,太宗服丧期间,一切政务皆令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承乾裁决。承乾年纪虽幼,却表现得颇识大体,处断有度,深得太宗赏识。自此,太宗每离京出巡,常令承乾居守监国。如果一切如此正常地发展下去,承乾本来大有希望成长为父亲心目中理想的接班人。

孰料随着承乾年纪渐长,却对声色犬马沉迷无度起来,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作为父母的太宗和长孙皇后,对未来的储君过分严厉的缘故。承乾好动,不喜儒学,然而作为皇室的继承人,这一点是决不容姑息的。因此,长孙皇后每每严加训诫,希望他能有所长进,谁知却适得其反。再者,大概就是出于太宗对承乾同母弟魏王李泰、异母弟吴王李恪的过分喜爱。



长孙皇后卧病弥留之际,坚决不许自己的儿女前来探视,说是怕他们见了,徒惹悲伤。对此,承乾疑惑不已,他总觉得是母亲不喜欢自己。在临终之前,她又向父皇请求立她所喜爱的魏王李泰为太子。怀着这一疑虑,他整日忧心忡忡,暗中观察父皇太宗对弟弟魏王李泰的态度,心中就越发印证了自己的怀疑。于是便越发地放纵怪诞起来,恣情胡闹。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以三十六岁的盛年病故。此后不久,唐太宗忽然向朝臣宣布,他要立杨氏为皇后,而这个杨氏就是吴王恪的生母。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位吴王的生母杨妃偏偏又是已灭亡的隋朝炀帝的亲生女儿,于是这使本来就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杨妃自幼生长于宫廷,受到良好的熏陶教养,气质高贵,艳丽逼人,加以气量宽宏,且已为太宗生有吴王李恪、蜀王李愔二个儿子,本来也并非没有资格接替长孙皇后的位置。然而,因为她是隋炀帝的女儿,这一可能性就变成了不可能。

大臣们一方面以杨氏为隋炀帝之女,决不可母仪天下,另一方面,他们纷纷在看长孙皇后的哥哥,当朝宰相长孙无忌的脸色。对于此事,长孙无忌虽然始终缄口不言,但这沉默所表达的含义再清楚不过了,杨氏为后,吴王李恪就成了嫡子,太子承乾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其实,太宗之所以要坚持立杨妃为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他对吴王李恪特殊的喜爱。在众多的儿子中,从相貌、气质、性格上,吴王李恪都是与父亲最为相像的一个。他受封为吴王是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并授益州大都督之职,因为年纪尚幼不曾就职。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又授安州都督。这时吴王已经成年,碍于祖制法度,太宗不得不割舍父子亲情,让自己的爱子就封赴职。临行之际,太宗亲笔作书告诫,依依惜别。

然而不久,弹劾吴王的奏疏就递到了太宗的手上,侍御史柳



范上书，公开弹劾吴王李恪频繁狩猎扰民，地方百姓多有怨言。众目睽睽之下，太宗不便卫护，只好忍痛免去吴王官职，削减年俸。

然后，太宗把这口恶气出在了担任监督辅助吴王之职的长史权万纪身上，斥责权万纪：“服侍我子，却未能匡正他的过失，罪该万死！”

这时候，那个多事的柳范又站出来替权万纪抱不平：“房玄龄在陛下身边，尚且不能阻止陛下狩猎，何况权万纪？”

太宗当即大怒。幸而他还是以肯纳忠言的英明君主自居，便强按怒火。退朝后，单独召见柳范，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缓：“卿何以当众使朕难堪？”

仰望着不怒自威的太宗，柳范出了一身冷汗，他硬着头皮回奏：“臣闻古训，‘君仁则臣直’，是以臣敢于当面直谏，圣上英明，必不怪臣冒犯龙威。”

这巧妙的奉承抚平了太宗的怒火，他微笑着挥挥手让柳范退下，于是，一场风波化于无形。而在太宗内心深处，也不得不遗憾地放弃了扶持吴王，立杨妃为后的打算。

他又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

太宗之所以产生更易太子的念头，实在是基于他对太子承乾的失望。

开始，承乾的荒淫无度，太宗并不知情。这个自幼聪颖过人的孩子，现在将他的心计全部用在了对付他父亲上。每次临朝，必大言忠孝之道，揣度有人将要向太宗奏明自己的过失，便抢先引咎自责，巧言饰非，为自己百般辩解开脱。故而一直将太宗蒙在鼓里。

然而，同在太极宫内，东宫与大内不过一墙之隔，随着承乾变本加厉地穷奢极侈，宫墙再高，也还是有风声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

承乾荒淫无度，东宫之中，美女无数。此外，他还有断袖之癖，好蛮童，常常引至帐中，昼夜为嬉，致使东宫宦官得势。有个



太常乐人，年方十余岁，姿容娇美，能歌善舞，承乾倍加宠爱，特别给他起了个爱称，叫作“称心”。

太宗知道了，大怒，派人将称心抓起来杀掉，犹不解恨，牵连杀死数人方才作罢。承乾怀疑是魏王李泰告的密，痛悼称心不已，特别为他在自己的东宫设置了灵常，中立其像，列偶人车马于两厢，命令宫中朝暮奠祭，承乾亲至灵前，痛器流涕。后来，又在宫中修冢而葬，并赠官树碑，以志哀悼。自此，承乾便以生病为借口，不上早朝达数月之久。

更有甚者，一日，东宫突然传来疯狂的鼓声，原来是太子承乾在自己的宫中铺毡设帐，杀牛烹羊，让宫女宦官数百人换上异域胡服，梳起胡人的椎髻、剪彩绸为舞衣，呼喝舞蹈。自己也穿了突厥人的衣服，以佩刀割肉，和手下人纵声谈笑，学了突厥可汗的样子行乐，鼓角之声，昼夜不绝。

承乾暗中找来在长安寓居的突厥人，学习突厥语，他对突厥的葬礼尤其感兴趣，常常自己穿戴整齐，扮成尸体，僵卧庭中，命令手下骑了快马在自己周围奔驰，然后他会突然一跃而起，看着他们受惊吓的样子，放声大笑。

汉王李元昌是高祖李渊的第七个儿子，太宗李世民的异母弟，与太子承乾年龄相仿，脾气相投，二人常各率手下，分成两队，模仿突厥骑兵作战，双方真刀真枪，甚至互有伤亡。每每玩到兴头上，承乾便激动不已，指天大叫：

“有朝一日为天子，一定要率万骑，在突厥的金城（甘肃省兰州市）尽情狩猎！”

“我若为天子，第二日便与汉王各率万人为战，尽兴而归！谁敢阻我，立诛无赦！”

承乾对胡人的生活方式如此热衷，大概是祖先异族的血统在他身上的复归。

辅佐太子的右庶子张玄素闻听，赶紧赶来叩头阻止。承乾不仅不听劝阻，反而抡起手中的羯鼓，猛击张玄素头部，张玄素顿时血流满面。



后来,承乾忽然患上了严重的足疾,以至于行走都产生了困难。他从父亲太宗的脸上看出了明显的厌恶,于是,他一方面更加放纵妄为,自暴自弃。另一方面,对得宠的魏王李泰更是产生了深深的嫉妒和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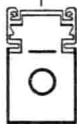
左庶子于志宁与右庶子孔颖达身负辅导太子的重任,不得坐视不管,于志宁特意写了《谏苑》二十卷劝谕,孔颖达也多方法规劝,太宗知道了以后,对他们大加褒奖,特赐帛缎、黄金。

面对这样一个颓废无行的儿子,太宗怎能不考虑,大唐的江山社稷,到底该交予何人之手?

魏王李泰,字惠褒,乳名青雀,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很有文采,与不爱读书的太子承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太宗对他也是十分喜爱。因为魏王喜好文学的缘故,太宗特令在魏王府新增设文学馆,学士由魏王李泰自选。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文学馆正式落成,命名为大开馆舍,驸马都尉苏勣向魏王李泰建议,自古名王多引宾客,以著述为美。魏王李泰遂向太宗请求,召集国史编集官著作郎萧德言、秘书省属官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堰等学识渊博的重臣,修撰《括地志》,并广召天下贤士。一时间,魏王府前门庭若市,魏王好士的美名遍传天下,太宗对此也大为欣喜。

太宗还亲自驾幸魏王李泰在延康坊的府第,不仅厚赏魏王府官吏,而且爱屋及乌,索性免除了延康坊百姓一年的租赋。魏王李泰体胖,腰腹庞大,太宗关心他上朝趋拜不便,特别允许他乘小轿入朝。而当时在世的许多开国老臣多已年迈多病,太宗却从未想过给他们过多的恩惠。即使不太敏感的大臣,这时心里已经多少明白了将会发生些什么。居然在这时,有人敢于站出来指责太宗的不当,这个人就是曾当过李泰老师的礼部尚书王珪。

王珪的性情耿直刚正是出了名的,当时,高祖、太宗的许多公主都下嫁给功臣之子,王珪的儿子王敬直也娶了太宗的第三个女儿南平公主,公主们与生俱来的骄傲,使她们大多不把丈夫





家的人放在眼里,南平公主也不例外。可王珪硬是强行让她以子妇之礼侍奉公婆,他与妻子就席而坐,让公主执笄,用簪(器名)装着枣子、栗子和鍼修拜见公婆。枣取早自端庄持重之义,栗取敬栗公婆丈夫之义,鍼修取断断自修饬之义。又行盥馈之礼,指的是儿媳过门侍奉公婆进餐用食之礼。此举当时还得到了太宗的支持。

现在,王珪又对这过度的恩宠看不过眼了,他向太宗进谏:“近来就是三品以上的公卿,见到了各位亲王,也要下轿叩拜,此举不合法度,望陛下予以废止!”

太宗听了,心中不快。王珪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太宗心里也明白,他所说的各位亲王实际上专指的是魏王李泰。于是,太宗的语气中将这种不快直接表达了出来:“卿是轻视朕的皇子们吗?”他严厉地盯住王珪,“人世祸福莫测,将来万一太子不测,皇子们中必有一人是卿等的君主,卿何以轻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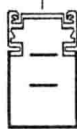
此番言语一出,大家心里都明白,易储之事,势在必行了。

此时,太子承乾的儿子李象早已被立为皇太孙,即皇室的第二位继承人。于是素以敢谏闻名的宰相魏征,马上站出来反对太宗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都是父传子位。兄终弟及,必生祸乱,劝太宗以国家长久基业计,谨慎从事。

李世民只是严厉地看着他,什么也没说,但他心中的主意已经不可更改了。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春,在魏王李泰的组织下,五百五十卷的《括地志》宣告完成,由魏王李泰上呈太宗。太宗十分高兴,传旨提高魏王李泰的俸禄,予以嘉奖。

然而这样一来,魏王李泰的月俸就超过太子承乾。谏议大夫褚遂良马上站出来说话:“圣人建礼,嫡尊庶卑,储君的用度,可以和君主相比,庶子体卑,不得为例,这样才能避嫌疑,除祸乱,纵是喜爱庶子也不能超越礼制。嫡子是正体,应特别尊重,否则是因私害公,惑法乱国。陛下更应以身作则。现在,魏王的俸禄逾出太子之上,有违礼制,已引起朝野非议,古有名训:‘爱





子教之以义方。’魏王年轻,更应该尊重皇储,克己勤俭,唯忠唯孝,道德齐礼,这才是为弟为臣之道。”

一番大道理说得太宗无言以对,只得收回成命,但同时他又传旨让魏王李泰迁到太极宫内武德殿居住。按理,已成年的皇子,除太子外是不得留居于宫中的。况且,武德殿曾是太宗作太子时的居所,这一用心的内涵就更加显而易见了。所以马上又有魏征站出来反对:“魏王移居武德殿,与东宫仅一墙之隔,尊卑不分,足使魏王处于嫌疑之地。况武德殿曾是齐王元吉旧所,魏王居住,恐有不祥。”

元吉是被太宗杀死的弟弟。魏征这样一说,太宗也不好反驳,这件事又只得作罢。不过,自此之后,魏王就更加不离太宗的左右,太宗自早朝后,一直就把魏王留在身边,直至初更时分。太宗的用心已昭然若揭。

使太宗始终下不了决心废承乾立魏王的原因,是玄武门之变自己兄弟相残的血腥一幕,他不愿意这一切在自己的儿子们身上重演。可就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已各自广罗党羽,形成了两派水火不容的势力。

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黄门侍韦挺、工部尚书杜楚客纷纷投靠魏王李泰,并四处为他邀结朝臣,自为朋党。太子承乾畏惧魏王有夺嫡之意,想先发制人,暗中派人诈称是魏王李泰府中小吏,到玄武门持书告发。太宗接了奏章,见其中说的都是李泰的罪状,根本不信,派人去抓告密者,此人已潜逃不见了。从此,太子与魏王之间明争暗斗不断。

于是,忠义的大臣们不得不直言进谏。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一次早朝议事,褚遂良提出:“国家的当务之急在于分清嫡庶。”把太宗一直悬而未决的心事摆到了桌面上来讨论。

这次太宗很爽快地答应:“从今而后,太子一切用度不加限制。”

这表面上看来是在抬高太子承乾的地位,实质上,太宗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性情已了如指掌,他是想让他自作孽,不可活。果



然不出十天，太子承乾就从国库中支用了七万钱。挨过他一次痛打的左庶子张玄素只好又出面劝谏，结果是太子承乾不但不听，反而命人埋伏在张玄素必经之处，又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几乎要了他的老命。

为了显示对太子加强管教，太宗又将年迈体衰，刚刚大病初愈的重臣魏征请了出来，出任太子太傅。其实，魏征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完成这一任务。第二年正月，他就病重去世。太宗如此做，只不过是向天下人表示，他对承乾已做到了仁至义尽。

太宗没有料想到的是，他的儿子承乾并不肯乖乖地伏着作砧上之肉，他像一条刚刚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蛇一样，静静地伏在草丛暗处，蓄积起全部力量，准备向太宗发出致命的一击，而把他从麻木中唤醒过来的，竟然是太宗的老臣、凌烟阁上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的陈国公、吏部尚书侯君集。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太宗作秦王时即相追随，玄武门之变中为太宗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太宗即位后十分倚重，任以高官。

高昌之战胜利后，侯君集私自掠取财物，为手下将士所知，于是群起而效之。侯君集因此获罪入狱。太宗因念其有大功，未加治罪，侯君集却自此对太宗心怀怨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承乾察觉侯君集心生怨恨，便让侯君集的女婿、东宫千牛贺兰楚石相为引见，向他求教保全自身之策。侯君集本来看不起承乾，不过他怀了私心，企图扶立承乾后，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鼓动承乾弑父篡位。

然后，他们又联合了为太宗所杀的兄长太子建成的旧部左屯卫将军李安俨、高祖的第五个女儿长广公主之子、洋州（陕西洋县）刺史赵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杜如晦之子、太宗第十六女城阳公主的驸马杜荷、汉王元昌等人，歃血为盟，准备伺机推翻太宗，拥立太子承乾即位。

就在承乾一党暗中筹划，图谋不轨之际，远在齐州（山东省济南市）的太宗第五子，齐王李祐却突然打出了反叛的旗帜。